

咸丰庚申之变曾国藩集团“拒不北援”说质疑

胡忆红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 1860年曾国藩集团对待北援问题的态度, 人们通常认为是“按兵请旨”, 拒不北援。《北援集议》等相关资料研究发现: 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不足; “请旨”既是曾国藩北上必须要走的程序, 又是迫于当时形势的结果; 在清廷撤消北援之前, 湘军北援各项重要事项均已暗中安排妥当, 由此可以证实曾国藩集团并未拖延敷衍, 拒不北援。

关键词: 曾国藩集团; 咸丰庚申之变; 《归庐谈往录》; 《北援集议》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5-0670-04

第二次鸦片战争自1856年9月开始, 时战时停, 前后延续了四年之久。1860年6月, 英法联军从北塘登陆, 击败僧格林沁率领的精锐骑兵, 长驱直入, 占领天津, 向北京推进。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行宫, 在途中令恭亲王奕訢留守北京, 准备谈判, 同时接受胜保的奏请, 下令各地督抚带兵进京“勤王”。其中有一道谕旨是给曾国藩的, 令他饬派湘军悍将鲍超带领湘军二三千人进京“勤王”。当时, 接到命令的各地督抚除曾国藩和苗沛霖外, 都很快派出了援兵。据此, 一般认为, 曾国藩集团采取“按兵请旨”的策略, 拒不北援^[1-3]。北援原本只是一场虚惊, 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影响都很大。时至今日, 仍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断对其进行研究。然而, 虽然研究者众多, 但一些问题仍存有误解之处。笔者翻阅了曾国藩、胡林翼的书信、日记、《北援集议》等相关资料, 发现曾国藩集团事实上并没有“拒不北援”, 主要理由有以下三点。

首先, 上述观点所依据的史料来自于清人徐宗亮的《归庐谈往录》, 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史料可供佐证。据《归庐谈往录》记载: “庚申淀园之变, 曾文正、胡文忠二公皆议入卫, 而诸军深入皖境, 分驻大江南北, 进退均难。集文武参佐, 各立一议, 多以入卫为主。合肥相国时在文正幕中, 独谓夷氛已迫, 入卫实属空言, 三国连衡, 不过金帛议和, 断无他变, 当按兵请旨, 且无稍动。楚军关天下安危, 举措得失, 切宜慎重。二公是之。”^{[4](41)}徐氏曾任胡林翼、李续宜和李鸿章三人的幕僚, 因此, 长期以来, 其说往往被人认为

可信而采用。事实上, 这是一例孤证, 不能据此为论定。而且《归庐谈往录》成书于1886年9月, 事隔26年, 徐氏难免会存在记忆不清之处。他亦自称该书撰述“事非一时, 后先颠倒, 本不以为著录”^{[4](1)}。因此, 这就不能确定该则史实的记载是确信无疑的。

据《归庐谈往录》记载, 曾国藩接受了幕僚李鸿章的建议, 才采取了“按兵请旨”的策略。事实上, 李鸿章在此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持的态度有待重新认识。曾国藩接到北上的谕旨后, 找过李鸿章商量对策。8月28日他“夜与少荃久谈”^{[5](533)}。从曾国藩日记来看, 这是曾、李在此期间仅有的一次谈话。但这次谈话似乎未能帮助曾国藩从困境中解脱出来。9月3日他还在日记中写下“不知所以为计”^{[5](534)}。当然, 由于此事的高度机密性与敏感性, 曾、李二人谈话的真实细节和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李鸿章对待北援的态度还是有文献资料记载的。据《北援集议》记载, 李鸿章曾明确指出: “今日之事, 不论利害论是非, 应得旨即行, 自宜不动声色, 预为布置。”^{[6](2612)}也有人对《北援集议》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大概由于内部议论, 过于直露, 不宜公开发表, 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7](122)}然而即便删除“按兵请旨”, 也不影响表明李鸿章支持北援的态度。在《北援集议》中, 李鸿章明确提出了几条北援对策, 如建议曾国藩“带鲍军及马队二营, 朱、唐二将中酌择一位, 加以鄂军应诏之二千人或三千, 希公处抽一小统将, 已成一万之数”; “北征须裹两月行粮, 约十二万”等^{[6](2613-2616)}。显然, 认为李鸿章不赞

收稿日期: 2009-03-10

作者简介: 胡忆红(1979-), 男, 湖南衡阳人, 历史学博士, 湖南科技大学历史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文化史。

成北援与历史事实不符。

又据相关资料记载，在北援事件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是张芾和李续宜二人。张芾时任皖南团练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在曾国藩大营。曾国藩初奉派兵入卫京畿的谕旨便来与之商量。张芾对曾国藩说：“专为统兵大臣则可拜表入卫，兼为两江总督，则有守土之责，又值皖南败坏之际，未可弃此而他行。”^{〔8〕〔1627〕}曾国藩在7月被任命为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8月实授，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此时的曾国藩已是统辖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四省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自然不能擅离职守，失隐封疆。所以，张芾提醒曾国藩作为封疆大吏的守土职责，给曾国藩很大警示。后来曾国藩致信江西巡抚毓科说：“弟因其言有至理，故请旨遵行。”^{〔8〕〔1627〕}然而事关重大，曾国藩还是拿不定主意。9月4日李续宜来到祁门，促成其事。5日夜曾国藩便“复奏征鲍超入援之旨，至灯时始毕”^{〔5〕〔534〕}。这份奏折是《奏请带兵北上以靖夷氛摺》。据曾国藩称，奏折的内容是其与李续宜共同商定的。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楚军入援之谕本日始行复奏，恭亲王之咨，亦钞折咨呈复之。兹将折稿呈呈台鉴。主意系希庵所定，与侍初计相符。”^{〔8〕〔1605-1606〕}实际上，李续宜是受胡林翼派遣，专为商议北援之事而来。李的意见不仅是他本人的意见，而且代表了胡林翼的意见。

综合上述分析，除了徐宗亮在《归庐谈往录》中认为李鸿章反对北援外，还拿不出第二条确实可信的史料来证明这一记载的可靠性。而查阅曾国藩、胡林翼的日记、书信、《北援集议》等资料，可以确定李鸿章是赞成北援的，张芾、李续宜在此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就确定徐宗亮关于该事的记载不据为信。

其次，“请旨”不是曾国藩集团拖延时间。许多研究者认为，曾国藩的奏折看起来是十分重视北援，实际上是拖延时间。因为奏报至北京，诏旨再至曾国藩大营，路途往返就需要一个月。曾国藩奏折是9月6日寄出，清廷的批复，最快也要在10月初才能到曾国藩大营。而曾国藩估计和与战，最晚至9月底当见分晓。如果清廷屈膝求和成功，北援自然取消。为了弄清史实真相，我们有必要对“请旨”的内容进行仔细考察。其大体内容有两点，即不同意鲍超入援和请求清廷由曾国藩、胡林翼二人中指派一人统兵北上，护卫京畿。

鲍超虽是湘军的一员悍将，但其才不足以承担独自领军北上“勤王”的重任。对于鲍超的才能，以知人著称的曾国藩在《复张芾》信中说：“鲍镇之才，亦难多统。现统六千，内有新勇二千六百人，未知其能统

驭裕如否？将来仍须另择统领。”^{〔8〕〔1522〕}这封信是7月25日写的，比曾氏接到谕旨早一个月，不可能为应付朝廷而捏造的推诿塞责之词。胡林翼也曾历数湖北将才，说：“李第一，多第二、○第三，鲍第四、○第五。”^{〔6〕〔727〕}又说：“二等三四等之将如鲍、如余之类。”^{〔9〕〔726〕}在曾、胡看来，“鲍超虽号骁雄之将，究非致远之才”^{〔10〕〔1240〕}，无力肩负起北上“勤王”的重任。荆州将军都兴阿曾奉召统兵北上，但行抵寿州，便因统筹失当、粮饷不济而徘徊不前。曾、胡担心鲍超北上，很可能会重蹈都兴阿的覆辙。胡林翼在致鲍超的信中说：“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9〕〔744〕}可见，曾、胡不放鲍超北上，主要是考虑到其不适合做北援统帅。出于这样的考虑，曾国藩才决定由他或胡林翼充当北援统帅，准备领军进京“勤王”。依照这样的安排，曾、胡二人无论谁北上，以他们的地位、才能和协调能力，是可以缓解鲍超北上遇到的困难的。可见曾国藩集团之所以不放鲍超领军北上，而改由曾或胡率军北上，确实是出于对北援的高度重视。

但是曾国藩为何不立即率军北上呢？揆诸史实，其原因有二：其一、曾国藩已为封疆大吏，有守土之责。遵照清代地方官吏朝谨规制，曾国藩若要率军北上，“请旨”是一道必需的程序。曾国藩在致江西道员李恒信中作了解释，他说：“国藩思带兵入卫，拜表即行，商之张小浦副宪，渠以为仅为统兵大臣，则可拜表即行；兼为两江总督，则有守土之责，自当请旨遵行。”^{〔8〕〔1630〕}其二、此时的曾国藩正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压力，恐不易脱身北上入卫。他在两江总督宝座上还没坐热，太平军李世贤、杨辅清部在半个月的时间内连克宁国、徽州、绩溪、屯溪、休宁，逼近祁门，威胁曾国藩祁门大营。尤其是徽州府失陷，曾国藩祁门大营东边屏障大开。29日他在日记中写下：“日内因徽防败兵、宁防败兵、楚军败兵，共不下二万人，纷纷多事，日不暇给。”^{〔5〕〔533〕}9月初，曾国藩又得到消息，太平军准备大举进攻安徽，“观安庆所获狗逆伪文，则九、十两月，皖北、皖南俱有大仗开，南三省之能否支持，安危之数，即在近日可决。”^{〔8〕〔1626〕}胡林翼也非常清楚当时的局势，他指出：“皖省战事尚相持未决，惟楚师一动，皖中必有变故。”^{〔9〕〔722〕}这样的军情已不容湘军统帅曾国藩擅自北上，正如胡林翼所说“勤王之义，拜表即行，因与贼近，改为请旨”^{〔9〕〔720〕}。可见，“请旨”亦是迫于当时军事形势的结果。

从上述分析来看，“请旨”既是曾国藩北上必须要走的程序，又是迫于当时形势的结果，并非是他想以往返奏报的办法拖延敷衍。

最后,在清廷撤消北援之前,湘军北援各项重要事项均已安排妥当。从曾、胡的书信、日记等资料来看,他们拟北上入卫的态度非常明朗,均有意领军进京“勤王”。胡林翼曾致信李鸿章告别:“吾等将北征。”^{〔9〕(720)}曾国藩甚至准备带其弟曾国荃一同北上,9月7日在致曾国荃的信中说:“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望沅弟即日定计,复书告我。”^{〔11〕(580)}自9月初始,曾国藩集团在暗中开始积极地筹备北援。

湘军北援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北援将帅的安排。曾国藩在9月6日回奏中已初步作出了安排,“惟臣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左宗棠同行……胡林翼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李续宜同行。”^{〔10〕(1240)}随后他将奏折抄了一份寄给胡林翼征求意见。曾、左、胡、李四人是当时湘军集团主要的领军人物,四去其二,必然不利于东南局势的稳定,“掣动南北两岸之全局”^{〔8〕(1637)}。曾国藩最初的人事安排明显偏重于北援,不利于南方的军事局势。所以胡林翼甫接到曾国藩的信,立即回信强烈要求若清廷指派他去,“应强留希庵,以独当楚北、皖北之艰巨,硕果萌芽,异日发生,可大可久,而自以鲍春霆、余会亭合计万人同行,北援甚切,林翼不敢迟行。战将无人,军声难振,鲍军必应同行也。”^{〔6〕(2621-2622)}从清廷当时面临的局势来看,胡林翼的建议无疑更为稳妥慎重。曾国藩遂采纳了胡林翼的意见,并在胡的启发下也改变初衷,决定留左宗棠守江西,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说:“承批示各议及尊议,均极精当,不带希军之识,亦与鄙人少带北兵之意,微相符合。大约公行则带鲍,待行则带凯,此局若定,则江西、湖北不甚决裂耳。”^{〔8〕(1637)}9月20日曾国藩将北援的人事安排通知左宗棠:“北援专以明臣子之义,不问事之济否,润去则留希以保湖北;弟去则留公以保江西,弟与润两人之意,皆已决矣。”^{〔8〕(1642)}也就是说,大约在9月下旬,湘军北援将帅的人事安排已经完成。

与此同时,曾、胡也在考虑如何动员湘军将士支持北援。在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北援的几大困难,诸如湘军士兵惮于北行,途中筹饷困难等等。这些问题是可大可小,若处理得当,算不上困难;若处理不当,有可能造成士兵哗溃。这种情况在湘军史上屡见不鲜。因此,如何安抚北援将士成为曾、胡考虑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湘军营制最关键的部分是薪饷制度。湘军将士的薪饷普遍高于绿营。如陆师正勇每月发饷四两二钱,营官月薪五十两,较之绿营兵多出数倍。待遇既优,各兵勇除自用外,还可养家,于是参加湘军之人络绎不绝。因此,曾、胡首先准备利用更为优

厚的薪饷作为激励机制,令湘军将士支持北援。他们拟定散勇、亲军、什长、火勇、长夫,每名每日加二分,月加六钱,家属每月各支坐粮一两;哨长每月加三两,家属月支四两;营官每月加三十两,办公经费一百五十两,仍照旧不改,家属月支四十两。其次为湘军北上提供便利条件。例如在湖北省城或德安、襄阳置办干粮,“以三百石为率,委员用大车解至河北卫辉等处。如有实不能喫面之人,酌量给食”。雇用车马等交通工具,“自信阳以后,雇车二百辆,装载军械、子药、帐房。勇丁空手行走。夫亦仅担衣物。又令每州县办短车,按站替送,俾各勇丁轮流坐车,稍资休息”,等等^{〔6〕(2610-2611)}。谋画之细致,反映出曾国藩集团对待北上入卫的认真态度。

曾、胡在筹备北援钱粮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按北援将士的薪饷规定,军饷每月须银八万两,安抚家属又需一万五六千两,两项合计每月需近十万两。这是一笔不少的数目。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清廷财穷力竭,不能发放军饷,督抚将领就地筹饷,不再受户部控制,更以邻为壑不愿协济他省。湘军人物非常清楚北援湘军要想从沿途省份获取粮饷,无疑是火中取栗。胡林翼在致曾国藩的信中说:“林翼兢兢自恐,然北卫京师,非此不济,若待邻饷,犹画饼而充饥。”^{〔9〕(710)}所以,北援钱粮还需湘军从内部筹措。曾国藩提出:“此项银两,湖北行,则湖北八成,江西协二成。曾北行,则江西八成,湖北协二成。奏咨秦晋协饷。”^{〔6〕(2610)}也就是说,北援钱粮主要由湖北、江西两省筹措。湖北经过胡林翼数年的努力经营,成为湘军较稳固的后方基地。就饷项而言,湖北每年剩余百万。经过连年征战,使胡林翼陷入窘境,他写信给曾国藩说:“鄂省现办减成捐输,照例实职减四成,虚衔封典弟减二成外,今又定为交银二两五钱,作银五两,苟且之政,所增不多。”也就是说,湖北捐输已不满部定规格,又减一成,只收五成了。因此,胡林翼建议北援之饷须“三省合供”,即还须江西、湖南同时筹解,“合江西之百八十七万,湖北百万,湖南七十万源额,除五钱以下小户不计外,尚可增捐输百万两”^{〔9〕(710)}。10月初曾国藩已让江西巡抚毓科筹饷20万两,“以十二万为兵勇两月行粮,以八万为阁下与弟贡献,各行在户部赏赉之需”^{〔12〕(1695)}。北援筹饷已基本落实。

经上述考察论证,基本上澄清了一个史实:在整个北援事件中,曾国藩集团的表现是相当积极的,不存在拒不北援的事实。“请旨”并非是曾国藩集团以往返奏报的办法拖延时间。在清廷撤消北援之前,北援各项重要事项均已安排妥当,足见曾国藩集团对北援的高度重视。

注释：

- ① 持这一观点的论者有朱东安、陶海洋、谢世诚等，详见参考文献[1-3]。

参考文献：

- [1] 朱东安. 从一八六零年的北援问题看曾国藩集团[J]. 近代史研究, 1980, (2): 307-316.
- [2] 陶海洋. 1860年夏秋间胡、曾对援京的不同态度[J]. 安徽史学, 1996, (1): 51-52.
- [3] 谢世诚. 李鸿章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4] 徐宗亮. 归庐谈往录·卷1[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2.
- [5]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日记(1)[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7.
- [6] 曾国藩. 北援集议[C]//盛康. 皇朝经世文续编.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9.
- [7] 史林. 曾国藩和他的幕僚[M].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1998.
- [8]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书信(2)[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 [9] 胡林翼. 胡林翼集(2)[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9.
- [10]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奏稿(2)[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4.
- [11]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家书[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 [12]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书信(3)[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The Query of Zeng Guofan Group “refusing to rescue emperor” in 1860

HU Yih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About his attitude of going to Beijing “rescuing emperor” in 1860, people usually think that Zeng Guofan was refusing to rescue. Based on “Bei Yuan Ji Yi” and o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the author found that it is not the truth. First of all, this view is supported by insufficient evidence. Secondly, the “Qingzhi” (asking for Emperor’s instruction) was a procedure before Zeng Guofan went northward, and was the outcome of the situation. Finally, before receiving the order of withdrawing rescue from the Qing government, the important things had been arrange properly.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Zeng Guofan Group in dealing with the issue was quite positive.

Key words: Zeng Guofan Group; Refuse to go northward for relief; <Recorded of backing home to talk about>; <the debate about going northward for relief>

[编辑：颜关明]